

仰。”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错误论点。

由于当时没有解剖学,对于急死,如心肌梗死、脑溢血,以及钝器扑打伤造成的外部表皮完整,而内脏器官破裂或脑震荡等致死原因不能认识。由于没有显微镜和科学化验,对于血迹、精斑、毛发、毒物的化验对检验所起重要作用也不能认识。至于掘地蒸骨或煮骨的检验作法则是非常不科学的。“魔死”本属“急死”或“猝死”之类,但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知识,《洗冤录》称,“夜间魔者,元有灯即存,元无灯切不可用灯照”,则更属迷信不经之谈了。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法医学,正象我国古代天文学、造纸术、纺织等等一样,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但是,法医学直到清朝末年,仍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洗冤录》这一著作上。这与我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封建思想意识不重视法,是分不开的。纪昀说:“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刑为圣世所不能废,而亦圣世所不尚,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说明我国早在纪元前的周朝已有了包括法医学在内的法学,只是由于“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略存梗概而已”,致使许多法医学著述都亡佚无存。就连《洗冤录》这样一部有价值、有影响的法医学著述,宋人竟不收书目,《四库全书》也仅收目录而不存书。清姚德豫在《洗冤录解》中说:“作作,贱役也,重任也,役贱而任重,利小而害大,非至愚极陋之人,谁肯当此!故良吏必须熟习《洗冤录》,与之辩论确切,方令其喝报。若任其喝报,求无冤不可得也。”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以冤案不断的一个原因。



## 日本中国法制史学者代表团访问我国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滋贺秀三教授为团长,明治大学法学部岛田正郎教授为副团长,明治大学法学部讲师冈野诚、东京大学法学部助教寺田浩明为团员的日本中国法制史访华团一行四人,于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七日到我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我国解放后日本法学界来访的第一个法制史专业代表团。代表团到北京后,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等单位的热情接待。他们同上述单位的法制史学者分别举行了学术座谈。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和七月一日上午,在中国法制史学会北京部分法制史学者会上,滋贺秀三、岛田正郎和冈野诚三位先生分别作了《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历史和现状》、《日本对东北亚法制史的研究》和《日本对唐律的研究》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他们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的中国法制史学者自江户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概况;介绍了日本东洋法制史学者对东北亚法制史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唐律研究的状况,对《唐律疏议》究竟是永徽律还是开元律,冈野诚先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演讲受到了与会的中国法制史学者的欢迎。代表团在北京期间,还访问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历史陈列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部分原件。滋贺秀三教授一行于七月四日离开北京到上海和扬州进行了访问。在上海期间,他们同上海的法制史学者举行了座谈,于七月七日从上海乘飞机归国。日本中国法制史代表团对我国访问,广泛地会见了中国法制史学者,促进了中日两国法制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加深了两国法制史学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韩延龙 刘海年)